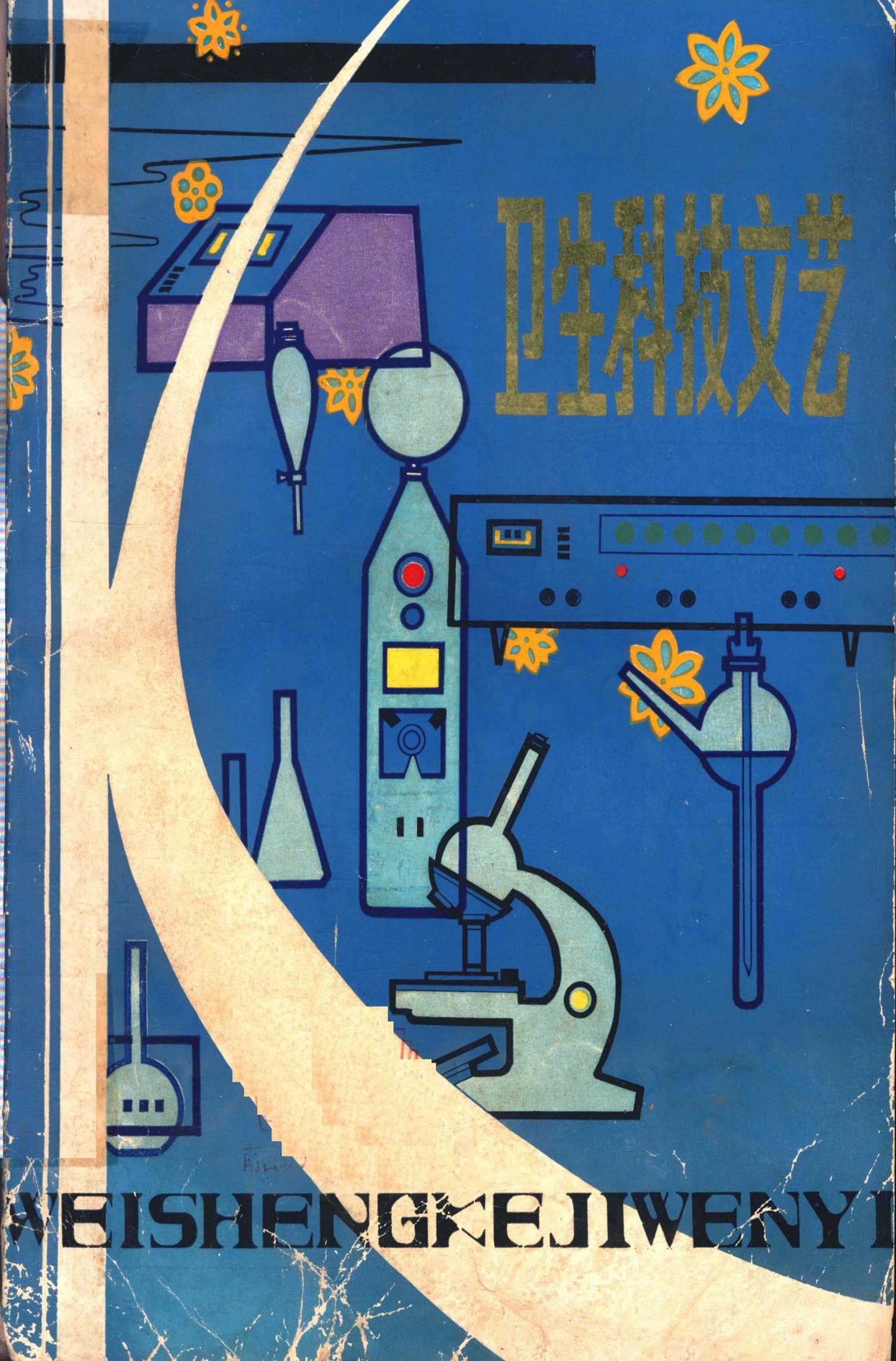


卫生科技文艺

WEISHENGKEJIWENYI



目 录

卫生科技文艺



一九八一年

中 南、华 东

铁路十一局卫生宣传协作区

南昌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编

(上海、济南、郑州、柳州、
广州、武汉、南昌中心防疫站、福
州、衡阳、长沙分局防疫站) 印

他的爸爸是谁	李宗浩 朗景和 (1)
烟(小说)	张孟祖 (7)
2001年采访到的故事(科学幻想小说)	鲁 南 (14)
手术延期进行(科学幻想小说)	侯成路 (21)
我没有想到死	(30)
——一个带有人工移植肾的孩子的自述	
(法)皮埃尔·德斯克罗伯,白凡译	
宝葫芦(科学幻想故事)	草 明 (35)
金星卫生防疫站采访记	登 耳 (37)
无声的战斗(诗歌)	姜 明 (40)
赞卫生防疫战士(诗歌)	翟 光 (41)
休息决不是浪费	志 冰 (42)
征服传染病的元勋——巴斯德	曹念明 (44)
一视同仁(相声)	侯宝林 (45)
非同小可(相声)	尘 踪 (47)
小杆兄弟的末日(科学童话)	
	柯玉生 徐又芳 (50)
盐的苦恼(科学童话)	乐 铭 (52)
小熊猫配眼镜	张德桂 (53)
神秘的医生(广播稿;录音访问记)	余达聪 (55)
人体内的化工厂	董书林 (58)
母亲之歌——致婴儿室的护士姑娘	刘风祥 (59)
血小板与白血球(寓言一则)	贾书铮 (60)
如此最重要(小幽默)	实 敏 (57)
罚不着我、爸爸谈戒烟(小幽默)	(58)
生死恋	(13)
绿色的颂歌(诗歌)	长 平 (54)
晨光	(29)
医生巧对	(34)
卫生儿歌	(36)
辛弃疾的《定风波》谜语	(40)
卫生谜语	(43)
封面设计	庄根生
封底设计	吴 军
封二、卫生摄影锦集	木易、登耳摄
封三、让祖国的天常蓝、水常清(歌曲)	
插图:吴军、张宪明	

他的爸爸是谁

李宗浩 郎景和

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我已经是个从事急救工作十多年的医生了。紧张的医疗急救使我整天坐着救护车到处奔波，虽然工作忙累，但是抢救成功的情景给了我很大欣慰，使我暂时忘却了一些思而不解的现实。

我们急救站的创建人陈主任是一个被戴有多种“帽子”的急救专家，可是现在被勒令做繁重的清洁工作。我一直在为他担心，但看上去他本人倒还坦然。司机王师傅是复员军人，凭出身、论资历、无懈可击，换了别人准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可他还是专心开救护车，我们仍是亲密无间的老搭档。

血淋淋的产科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日，凌晨三点钟。我和王师傅驱车来到一幢单元宿舍，急步跑上四层，一位老大娘已经在402室门口等着我们，她神态慌张，以祈求的眼神望着我们，战战兢兢地操着很重的浙江口音招呼着我们。

进屋以后，一个垂危病人的景象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床上纹丝不动地躺着一个年轻女人，她面色惨白，和灰白的墙壁几成一色。她闭着双眼，口唇毫无血色，身上盖着棉被，一条白晰的胳膊无力地垂在床沿，血顺着床单滴滴答答的往下流，地上已汇成了一大摊暗红色的血液。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场发生不久的凶杀案？！

但又见到在她身旁躺着个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全身裸露，皮肤灰暗，样子比他母亲（我不是法医，恕我这样直观地判

定关系）更难看，想必已经死了。

我顾不上向老太太了解情况，因为病人情况十分危急，需要我迅速检查，进行抢救。

她的血压已经测不到了，

脉搏也难以摸及，心率很快，呼吸浅表，全身无伤，腹部可摸到子宫，按摩腹部时有大血块排出，肯定这是产科出血性休克。大学期间，产科教授第一讲时，在黑板上写下的“血淋淋的产科”六个大字，油然在我的脑际浮起。

在病家抢救失血性休克，低分子右旋糖酐有着较好的疗效。它可以改善末梢血管的痉挛及微循环的供血不足。我很快给她输上了右旋糖酐，并从静脉途径给了升压药和子宫收缩剂。

用上药物之后，我赶紧检查胎盘和胎儿。胎盘倒是完整的，胎儿却很小，估计不足一千克，是个早产儿，男婴，发育方面唯一不正常的是左手第四、五指之间有类似蹼样的皮肤连在一起。可惜已经死亡。

病人的血压开始回升了，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开始向老太太询问事情的缘由。此时，老太太也平静多了，但她的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很吃力。我跟她讲，我也是浙江人，您就用家乡话讲吧。她指了指床上的病人说：“伊是我伲独生女，二十八岁了，今年五·一结的婚。他们没有房子，就住在我这屋里。结婚第二天，女婿被人家弄到干校去了，说是有啥大问题，再也没有回来过。以后她的肚皮一天天大了起来，厂里风言风语地讲她，伊养的是私生囡，要她交代什么作风问题。又讲她是反革命的老婆，劳动不给照顾，成天派重生活让她做。我女儿性子倔强，不求他们，让做啥就做啥。谁知道，昨天下班回来，突然被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从后面上撞

来，把她撞在地上。回来后，她就讲肚皮痛，下面流血，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王师傅急切地追问：“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呢？他撞倒人，怎么不管了？！”老太太说：“听我女儿讲，伊认得那个坏小子，可他有权有势有后台，唉……”

这时，我气愤地感到，事情决不是单纯产科出血问题。我从死婴脐带中取了血样，并且再一次详细检查了死婴，测量了他的各种径线。

此时，年轻的母亲已经苏醒，她只是微微地向我们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两只无神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在暗淡的灯光下一闪一闪，映出了她内心无比深沉的悲哀。

我用刺血针采了她的耳血，放在生理盐水里，以测定血型用。当我刺耳时，她竟然没有一点痛苦的反应，几乎连眨眼的动作都没有，不知是因为休克刚刚恢复，还是蒙受的痛苦太深了，她似乎对一切都是麻木的。

血型卡片

回到急救站已是东方大白了，我没有一丝疲惫，把两份血型测好，母亲是A型，儿子是B型。然后我骑车回家，路上脑子里很乱，现行反革命及其家属，结婚第二天上干校，暗设圈套、趁人之危、明张目胆地下毒手……或许她真是行为不端，给人抓住把柄，又遭……我是个急救医生，不是法医，我抢救病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什么还要多管闲事？

可是，一个医生的良心猛然提醒我，你不仅仅是治病，还要治疗了的人，人！这时，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个怀孕的妇女被撞倒在地，一片殷红的血洒在冰冷的马路上的情景……我又想起了那个女人的血型。

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血型关系，我已记不太准确了。陈主任教我们做的资料

卡片，已被定为“白专卡片”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了。手头上没有血型卡片，脑子里也搜罗不出这些记忆，怎么办？我不得不求助于我们的陈主任——现在的专政对象。但是又怕别人发现，增加陈主任的“罪行”——过去用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这一套拉拢青年，现在又继续放毒。这就必然会“罪上加罪”，给陈主任带来皮肉之苦。我只得相机行事。

一天我上厕所，正碰上陈主任在打扫便池。我见四周无人，便轻轻地问：“陈主任，您怎么样？”陈主任轻轻地嘘了一下，连头也没有抬，低声地说：“你快走吧，我很好。”顺手把一张卡片塞给我。我看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血型卡片。我惊异地望着陈主任：“您怎么知道的？”

“你别问，快走！”他焦急地说。

我看着埋头干活的陈主任，他两鬓花白，额头上青筋显露，他那专心致志地思考我们急救医学的头脑，和那双不知救活过多少生命的双手，现在……我望着他的背影，抚摸着手里的卡片，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陈主任怎么知道我要血型卡片？啊，一定是王师傅告诉他的。他陷身“囹圄”，却还助我一臂之力。

我没敢在办公室拿出来看，正好有一个急救外出的机会，于是在救护车上拿出了卡片，卡片上是这样一个表：

双亲和子女之间血型遗传关系

	双亲血型	子女可能血型	子女不可能血型
1	A×A	A、O	B、AB
2	A×O	A、O	B、AB
3	A×B	A、B、AB、O	
4	A×AB	A B、A、B	O
5	B×B	B、O	A、AB
6	B×O	B、O	A、AB
7	B×AB	A、B、AB	O
8	AB×O	A、B	AB、O
9	AB×AB	A、B、AB	O
10	O×O	O	A、B、AB

人的血型有A、B、AB、O四种。根据遗传学规律，知道父亲和母亲血型，可以推算其子女可能是那种血型，不可能是那种血型。自然，知道了父母、子女三者中的任何两者的血型，也可推测第三者的血型范围。急救车在街上奔驰，为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演绎出那个早产儿的父亲是什么血型，我的思想象风驰电掣的急救车一样在快速进行。早产儿的血型是B型，在上表的第3～第9排；他的母亲是A型，在上表的第1～第4排。两者的交叉在第3或第4排，这样，早产婴儿的父亲的血型可能是B型或AB型，决不会是A型或O型。可是，又如何能得到孩子爸爸的血型呢？

看来她并非行为不端

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事情发生的第三天，我下班后没有回家，径直骑车向那幢单元宿舍楼去，想找那位年轻的女同志好好谈一谈，也看一看她的病情恢复得如何。

接待我的仍然是那位老太太，她的表情似乎不比那天轻松多少。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愕，难道她不好了？那位女同志虽然不在，房间却收拾得很整洁，看来，不象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可是她重病刚过，现在跑到那里去了呢？我着急地问“病人呢？”老太太没有回答。我恐怕老太太没听清，稍为提高了一点嗓音又问道：“你女儿到那里去了？她怎么样了？”老太太沉痛地说：“谢谢依，依治疗得满好，第二天她就不流血了，可是身体虚得很。今天，她讲什么也要去上班。她趁我上街买小菜的辰光，就到厂子里去了，唉！”我真有点急了，“这怎么能行，这要把身体弄垮的，必须把她接回来。”

“女儿说，已经耽误一天了，再不去，要挨批判的”。“早产也有产假的，我是医生，我可以给她出医疗证明。”我便问了工厂的地址，想立刻去找她。正当我要走

的时候，几个女同志扶着她回来了。她面色苍白，毫无生气，好象一张白纸糊在她的脸上。见了我，依然是有礼貌地点点头，没有说话。老太太向大家介绍了我的身份，女同志可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请大夫快瞧瞧吧”，“刚刚小产怎么能上班，不是要人命吗？”，“真是欺人太甚，拿人命当儿戏……”。我看了看她，的确是太虚弱了，需要好好静养。我让老太太准备点东西给她吃，并对大家说：谢谢大家，你们也帮我对她进行了救护。现在就让她平躺着，不要让她睡枕头”，我一边说，一边将她头下的枕头撤掉。这样可以借助体位，使得血液充分地流向头部，以改善脑部的血液供应。

我和老太太一起送走了陪她来的女友们。我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看看老太太把一碗鸡蛋汤慢慢地给她喝了下去。随后，我又从静脉给她注射了50%葡萄注射液80毫升。不久，她苍白的脸色渐渐泛红，眼睛微微睁开，双唇慢慢染上了樱红色。我这时才发现她是长得很端正的，仪表沉静而庄重，具有一种东方民族女子特有的美。尽管她遭到了如此重大的精神创伤和肉体折磨，仍然朴实、恬静、落落大方，没有一点畏缩或自卑，在美丽的面庞中蕴蓄着刚毅的神情，但是悲愤之情隐藏在眉宇之间。她睁开了眼，对我歉疚地笑了笑，缓缓地说：“真对不起，麻烦您又跑了一趟。”这是她第一次开口和我说话。“好些了吧？”我问道。她点了点头我说：“好多了，谢谢您救了我的命，”我刚想插言，她却接着说：“当大夫的总是想方设法救人的命；可是世界上也有人总是居心险恶地害人的命。”她有些哽咽，泪水眼眶流到了枕头上，我赶紧劝道：“您要放宽心，您现在不是好多了吗，再请大娘给您补养几天，一定会很快康复的。”

由于我已大略知道了她的一些遭遇，

便问道：“你们是正式结婚的，别人为什么要这样恶意中伤呢？”她说道：“那帮人讲，结婚一天就怀孕？没那么巧，又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我说：“结婚一天就怀孕，有什么奇怪的，完全可以！”她又说：“我们车间有个女的，到处散布说我‘例假’刚完，正在‘安全期’，决不会怀孕的，孩子准不是……”我对这种愚蠢的荒诞之词觉得既可气又可笑。接着，她严肃地说“尽管我爱人被打成‘反革命’，我还是和他结婚。因为我了解他，他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她显得激动起来，白净的脸上泛起潮红。

凭我十多年来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我自信我的直观，相信有时一次交谈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她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没有一点故弄玄虚。我安慰她说：“您现在需要安心休养，不要生气，也不要悲观，忠诚的人总会得到幸福，玩弄诡计的人决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不是什么因果报应，这是规律，规律就是科学。我是医生，是搞科学的，我相信科学。”

当我和她们母女俩告别之后，回到家里，打开笔记本，完成了如下记述：

……他们今年五月一日结婚，虽然女方月经刚过，但受孕是完全可能的。

在生育年龄的妇女，一般说，她们的排卵期是在下次月经来潮前14~16天，如果在这个时期有性生活，精子和卵子相结合，即可受孕。而月经前后受孕的机会要少，这便是“安全期”的由来。但是，排卵可以随着环境、身体、精神的影响提前或推后。而排卵以后的“黄体期”是固定不变的，即14~16天。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月经间隔二十多天；有的人却间隔四十多天，关键是排卵早或排卵晚的问题。新婚或久别重逢的夫妇，女方常常不是在正常排卵期而受孕，就是因为这时可提前排

卵，这是毫不奇怪的，所谓安全期不安全也发生于此，而且，月经刚过比月经快来的时期更不安全。也就是怀孕机会更多些。

从她生下这个早产儿的大小和重量来看，也是符合的。婴儿差不多有1000克，正是七个月的胎儿。按计算公式，五个月以前，胎儿的身长是月份自乘；五个月以后，是月份乘5。七个月，即 $7 \times 5 = 35$ 厘米。这个早产儿的身长是34.7厘米，完全符合。看来这位年轻妇女在道德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但仅根据这些资料和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作结论，证据还嫌不足，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没有并指畸形

我应该找到孩子的爸爸，以便把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件事并不简单，必须向陈主任请教一下业务上的问题，也得和王师傅商量一下具体作法。

对陈主任的批判会照例进行，但是越开越冷场。对他的批判无非是“白专”、“成名成家”那一套。这些“炒冷饭”的东西，连一些积极参加批判的人也感到腻烦了。不少人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所谓陈主任的“罪行”，不正是他对急救站的功绩吗？一天下午，等陈主任搞好了全站的清洁工作后，我找了个机会和他见了面。还没有待我开口，陈主任主动问我，轻轻地问：“小江，怎么样？”我说：“我想去找她的爱人。”陈主任说：“除了血型以外，还有什么材料？”我说：“孩子的右手第四、五指是并指，这有意义吗？”主任带点责怪的口气说：“很有意义，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找他时要注意这一点”

王师傅已经从老大娘那里打听到她女婿在距这个城市七十公里的团城农场劳动，自从他去农场劳动后就没有回来过，也未通过信，现在情况如何，老大娘全然不知。我和王师傅决定坐长途汽车跑一趟。

十二月二十日下了夜班之后，我和王师傅乘车向团城农场进发，经过气势磅礴的长城，过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走到农场场部办公室，一个女同志正在低头抄大字报，她见我们风尘仆仆，就先发问：“同志，是来外调的吗？有介绍信吗？”样子倒还和气。王师傅说：“我们是来看一个亲戚的。”那女同志说：“没有介绍信，是不会客的，这是制度！”我说：“这不是干校吗？怎么这样严？”她悻悻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敢再说，怕把事情弄僵不好收拾。还是王师傅出来解了围，“同志，我们是好不容易来到这里的，还给他捎了一件衣服，就让我们见一见吧。”可能她看到我们的态度恳切，起了恻隐之心才问我谁。我们告诉她名字后，她说：“在三营七连二排五班一组。”说完她拨了电话，然后叫我们到隔壁房间里等着。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愿别出岔子。

差不多半个小时光景，那位女同志把一个身材高大、体态匀称的青年引了进来。他扛着一把铁锹，头发长而蓬乱，两鬓连鬓，目光深沉而忧郁。那女同志并不监督我们的会面，只叫我们快说，一会儿主任要来的。青年毫无表情，连头都没有点一下便坐在一条长椅上，放下铁锹，两手紧握上臂，在等候发问——他把我们当做外调的。

我开始说话：“我们是急救站的，您爱人早产了一个男孩，但不幸生下来就死了。大人当时也出了不少血，是我们俩去抢救的，现在基本恢复了。”他态度十分平静，淡漠地说：“谢谢你们。我料定，她会受很多苦的。你们今天就是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吗？”我说：“这是来的目的之一，”还没有待我说下去，他却颇为警觉地问：“谁让你们来的？”王师傅简捷地回答：“我们自己。”青年问：“为什么？”我说：“为了人民能平安健康的生

活。”那青年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甚至带点嘲弄的口气说：“大夫可能给人以健康，但没有能力使人平安。”我不禁哑然！

王师傅说“我们将竭尽努力这样做。”青年突然激动起来，似乎忘记了所处的地方，声音宏亮地说：“谁来保证人的平安和健康？结婚第二天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揪走，妻子受欺侮，孩子夭折，请问平安健康四字从何谈起？”为了抓紧时间，我连忙打断他的话：“朋友，我们今天不是来和你辩论，也不是和你探讨人生哲理的。我们来的另一个目的，想取你一点耳血和看看你的手，为了……”“请便吧！”青年说着侧过头来，摊开双手。我迅速地取好了血样，接着检查了他的手。他两手粗大，有些泥土，手掌已有一层老茧，手指的比例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发现并指。当我把他的手翻过来复过去看的时候，王师傅有点沉不住气了，在旁边嘀咕着：“这就怪了！”那青年听到这句话，不解其意，突然收回双手，拿起铁锹，站起身来愤愤地说：“你们要搞什么名堂？对不起，恕不奉陪。”王师傅赶忙上前，把一件毛衣递给他深情地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受你爱人委托给你捎来她织的毛衣，家里有事吗？我们一定转达。”青年双手接过衣服，长叹一声：“孩子死了，也好。请转告她们母女俩多保重，谢谢！说罢，扛起铁锹就走了。

我还坐在那里傻愣着，耳边响起了农场那位女同志的声音：“请吧，有外调的要在这里谈话。”我们向她道谢后，踏上了回城的路途。我的脑子变得象黄沙迷天一样的迷迷糊糊了。

并指畸形是显性遗传的，双亲中有并指的，儿女多伴有，也有没有的；可是儿女有，双亲总是会有的。而现在，父母双亲都没有并指畸形，那么这个孩子的并指如何解释呢？难道，难道孩子的爸爸果真

不是他吗？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一个东方民族美丽、贤慧、庄重的女性面貌浮现的在我的面前。

是我的直观违背了客观，感情代替了科学吗？

真相大白

经过血型化验，那青年是B型，血型是符合的，暂时使我的心情轻松了一些。但一想到并指这个无情的事实，我又陷入了烦恼之中，在这么大的一个大城市中，我如何去调查并指呢？

我和王师傅对这位年轻女同志一家人的印象很好，他们是正直、忠实、善良的。但是医生要服从理智，没有理智，就没有科学。我记起了陈主任讲过的一席话：“一医生要把感情和理智结合起来。对病人没有感情、没有深切的同情和爱护，不能做一个医生；但是，没有冷静的理智，没有尊重科学的品格，严格的科学作风和技术，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特别是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想当然代替一切，那他根本不配作医生，要不就是巫医，就是江湖术士。”

正当我在沉思时，王师傅推门进来给我捎来了陈主任的话，叫去找孩子的爷爷、奶奶。这真是雪中送炭，我明白了陈主任的意思。当天，我们借了一次外出抢救完毕的机会到了老太太家里。她的女儿已经入睡，我们问了一下她女儿的身体情况后，就谈起了她女儿的情况，最后问了她女婿父母的住处。由于他们已有几个月没有来往，我们从中还可以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

次日下班，我们来到了西城一个四合院。在一间南房里，找到了两位老人。老人对我们这不速之客有些惶恐，并有所戒备。但当我们拿出了工作证，介绍了身份，转达他们亲家的问候之后，谈话就十分融洽，毫不拘束了。两位老人在谈到儿子小时候的情景时，兴奋地把他淘气的样子绘

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并拿出了他小时候的许多照片。我和王师傅在一叠照片中，发现了一张百日留念的照片。当我们仔细端详了这张照片之后，高兴得几乎同时跳了起来，拿着照片，连声说道：“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们这种神态，把两位老人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大爷诧异地问：“同志，同志，你们怎么回事？”

亲爱的读者，我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我想你们知道后也会和我们一样高兴的。因为在百日留念的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孩子的右手第四、五指为并指！

为什么我们没有在那小伙子身上发现呢？

老人告诉我们：“孩子的并指不厉害，据医生说，如果骨头都并拢就比较麻烦，而他就一层皮，在周岁时就做了手术，是一位小儿外科和一位整形外科大夫共同做的，手术做得太好了，缝得特别细致，长大后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在上大学时，还是排球运动员呐！”

侦察小说常常是以在法庭审判为结尾的，真相大白之后，罪犯得到惩处，好人昭雪获释。本文中那位早产的女同志，客观上没有人把她当成罪犯、提交于什么法庭，受到什么刑事的牵累。但她所受到摇唇鼓舌者们的诽谤，却比关她几年更痛苦。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急救医生，无力激浊扬清。当我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之后，我把我们工作的情况告诉了那位女同志，以表示我们的抚慰。并在王师傅的鼓励下，写了一个“病情调查报告”，一式两份，一份留底，一份以挂号寄给了女方厂的革委会。虽然信发出后杳无音讯，但我相信我那份科学的调查报告将象海水一样足以冲刷掉吐在那位无辜少妇身上的沫迹。

如今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审判。浩劫已经过去，本文的那对青年男女，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为“四化”作出贡献，这一点，是值得读者和我感到宽慰的。

夜，六点多钟。我牵着五岁的女儿兰兰走在街上。一张彩色戒烟糖广告吸引了我的视线。它贴在一家商店的玻璃窗里，和巨大的“一九七八年”一起被霓虹灯晃得红一阵又绿一阵。

说不出是感情上的激动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匆忙跑进商店，一下便买了十盒。兰兰认得包装纸上那个“糖”字，以为是给她买的，伸手吵着要吃。

“馋鬼，给大人的。”我拍打着她的手心。

“给谁嘛？嗯……”孩子受了委屈，竟难过得要哭起来。

是呀，给谁？霓虹灯一闪一闪，把眼前的一切都照得扑朔迷离。两秒钟，绿了，绿得象我脖子上这条绿色腈纶围巾；两秒钟，又红了，红得象兰兰身上那件红绒上衣。给……哎呀，霎时，一股缠绵的情思朝我袭来，把我的心房冲击得怦怦直跳。于是，我又胡乱买了半斤奶糖，一把塞给孩子，拖着小家伙竟往肿瘤病医院那个方向走去……

四年前的一天，我男人患肺癌，在市去世。办理完丧事，我左手拎着旅行袋，右手提着一口皮箱，肩头上还骑着只有一岁多的小兰兰，孤零零地赶到K城火车站，准备乘车回S市。车站里，一长溜车厢爱理不理地躺着。从外面朝里看，车厢内很挤，所有的通道上都站满了人，所有的行李架都堆满了杂物。站台上，一群群的旅客跑来跑去，杂七杂八地咒骂着。开门的车厢，人们拼命地往上挤，挤得堵塞了，谁也进不去。一片乱哄哄的，车站发疯了。

我沿着白色的警戒线遛来遛去，最后

烟

张孟祖



只好垂头丧气地站着，心里嘀咕：“倒霉……”

“哈！你看”突然，有人在我背后嚷着，声音清新、悦耳。

“哎呀，这人也是……让小家伙遭孽。”另一个人也在车厢里伏窗着口发表议论，声音低沉、浑厚。他们都是一口S城的南方口音。

我看清了，说话的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和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男子。他们在车厢里，凭窗坐着，用手肘支撑在茶几上。两个人的手指间都夹着一支香烟。小的，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气；大的，一种漫不经心的姿式。他们用食指弹着烟头，烟灰纷纷，轻烟袅袅。这两个人好奇地打量着我。

“是坐车的吗？”那男子大概看见了我左臂上的黑纱，动了恻隐之心。

“嗯罗。”

“就你跟小毛毛？”

“嗯罗。”

他突然站起来，从窗口探出腰身，伸出一双健壮的手：“来，把毛毛给我。”

我愣住了。

“快吓！”那男孩也站起来，把烟卷叼在嘴里，“把东西给我……爬嘛，怕个屁……”

不能犹豫了。我递上东西，抓住窗边，两脚一弹，脑袋便进了车窗。女人的手臂没气力，那身子怎么也撑不上去。这男子又腾出手来，使劲把我往里拉。一二……谢天谢地，上来了。车厢里人挨人，挤得水泄不通，眼前没地方插脚，我只得顺势坐在茶几上，正好夹在他俩中间。我把兰兰抱过来，又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包糖果，衷心地酬谢两位好心人。那男



子摆摆手，客气地摇着头，微笑地谢绝我，也不说话。那男孩却大方得多，他挑出一颗糖，剥开透明纸，想送进嘴里，却又舍不得那小截香烟屁股。他接二连三地猛叭几口，直到快烧着手指了，才断然甩掉烟蒂。

我忍不住问他：“你多大了？”男孩说：“十四了。”天哪，十四岁就嗜烟成瘾，这也许是“史无前例”中的史无前例吧。我又问：“你妈不管你？”男孩歪着头说：“管得着吗？她搞地下工作去了。”我疑惑地问：“地下……”男孩说：“嗯，罗，就是阎王爷那里。六七年，她被人打死了。”“那么，你爸爸呢？”“在干校‘烧红砖’。我刚从那里来。”“家里还有谁？”“只有我。”外面一阵骚动，那

男孩又钻出窗口，看热闹去了。我望着他蓬乱的头发，望着他邋里邋遢的衣着，心里就象被刀割一样地感到痛苦。我慢慢偏过头来，瞟一眼那位男子。他仰着头，靠在椅背上，目光呆滞，好象心事重重。他含着香烟，嘬一口又深深往肚里一吸，憋上几秒钟，然后，口张开，朝头顶吞云吐雾起来。烟雾在我眼前萦环缭绕，辛辣刺鼻的烟味就象无数条眼镜蛇，直往我鼻孔里钻。他无疑是个烟鬼。我环视四周，到处都是烟雾腾腾。

我叹了一口气：“说正经的，抽烟不好，那里头有尼古丁……”

那男孩把头缩回来，冲着我说：“什么‘尼姑丁’尚、‘和尚丁’，屁！我不信。”

“真的。烟是有毒的。”

“唉，毒……”我身边这个男子闪动着一双忧郁的眼睛。

沉默。一阵悲哀凄凉的心情向我袭来。我浑身一震，嘴角翕动着，半晌，才哽噎地挤出一句话来：“死去的，什么都不晓得了。活着的呢？……怎么办？”我示意着左臂上的黑纱，“小家伙他爸爸，就是烟抽多了……得……肺癌死的……”

犹如一声霹雳，周围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惊愕地望着我，一声不吭了。那男子见兰兰在我怀里颤抖一下，立即起身，放下窗玻璃，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是惋惜，是怜悯，抑或是出于同情，他勾腰站起来，和男孩挤在一起，伸手指着他腾出

的座位：“喏……”，我感激地抱着兰兰坐了下去。

列车终于开动了，汽笛声撕裂长空，车轮铿锵铿锵地吼叫，铁轨在吱扭吱扭地呻吟。慢慢地，窗外罩上了黑幕，车厢里打开了灯。旅客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地睡去。兰兰没有醒，那男孩也睡着了。我困不着，拿出一团咖啡色毛线，打起毛衣来。那男子也没有睡意，他勾着腰，闷闷地抽着烟，一支接着一支。为了打破沉寂，我主动和他攀谈，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跟他闲扯起来。

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叫严琦，是S市肿瘤病医院的医生。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这所医院，在住院部工作，几乎天天跟肺癌病人打交道。每当送来一个病人，病人亲属对他寄予一种侥幸的、哪怕是万分之一希望的目光时，他感到十分的内疚、惭愧；每当一个病人临近死亡，在床上痛苦挣扎、呼喊、悲哀、绝望的时刻，他浑身都颤栗发抖。是呵，肺癌（当然还有其他几种癌）简直是医学界的百慕大三角，太可怕了。患了肺癌，住院治疗，最多是延缓一段时间的生命。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抵制肺癌对人民的入侵呢？他翻阅了一批医界老前辈的病历诊断资料，临床观察了许多肺癌病人，根据国内外统计资料，都说明因吸烟患肺癌的占肺癌总病人的百分之九十九左右。即使另外那百分之十，也多少与间接吸烟有关。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积极宣传吸烟有害，采取措施控制吸烟，从医学的道理上阐明吸烟的危害，教育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同这种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于是，他在领导支持下，组织起一批医务人员，骑着自行车，跑到一些机关、学校、工厂进行细致的调查，掌握了许多可靠的科学数据。然后，根据第一手资料，陆续编写了三十多篇宣传吸烟有害的科普

作品，发表在省、市报刊杂志上。这些作品，是十足的土产货，群众信服，嚼起来也蛮有味道，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上级领导对他的工作很重视，要他负责建立一个普查与宣传相结合的机构，进一步开展工作。正当理想的双翼带着他展翅飞翔的时候，广播喇叭里高喊着：“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平地一声雷，“暴动”来了！因为他宣扬吸烟有害的“活命哲学”，又是“以业务冲击政治”，挨了一顿批，下放到农村改造，直到七三年，才算“落实”政策，仍旧回到了肿瘤病医院。个人的委屈，区区小事，能重新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可是，变了，一切都变了：医院不接受晚期肺癌病人，除非他有后门；护士不愿跨进病房的门槛，除非里面有她们的亲友。吸烟已成为时髦的风尚，烟棍成了办事通融的敲门砖。因自己或家里人被批斗、打骂、抄家、为寻求刺激，甘心麻醉的人，开始抽烟；浑浑噩噩、到处“造反”的年轻人，也抽起烟来。因此，抽烟的人陡然大增。谁说文化革命的成果不伟大？“吸烟者陡增”就是伟大成果之一。肺癌有什么可怕？滚他妈的蛋！咳，抽吧！特别令他愤慨的是，有位省委负责同志，被罢官后回到S市。不久，得了肺癌。家属与医院党委联系，几经周折，总算让他住进了病房。不料，只两天，“造反司令部”查出了病人的身份，以医院“不是走资派的防空洞”的名义，又勒令他“滚”出了病房……面对着残酷的被颠倒了的现实，他苦闷、消沉、彷徨。他是力主戒烟的，由于抵不住这社会的恶性刺激，结果，自己也慢慢抽起来。一支、两支、三支——

“我一天要两盒烟。”末了，他颓唐地说。

“别人抽烟，可能不清楚抽烟的危

害。你是医生，懂得的，却偏偏要选择这条慢性自杀的道路。何苦呢？”我说。

“你学过《矛盾论》吗？”他反问我。

我点了点头。

“事物是矛盾的，”他用呆板的说教式的口气，一字一腔地说，“人，也无时无刻不处在矛盾运动之中……”

“你呀，”我又好气又好笑，“用烟来躲避矛盾，寻求刺激。是不是？”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又点上一支香烟。

我的心不禁一缩。我的家庭刚刚上演了一场悲剧，仿佛看到另一场悲剧又在严琦的家里排练、预演。他爱人不劝阻他吗？他的孩子多大啦？他不珍惜自己，怎么也不给爱人和孩子作一点考虑？……

我和严琦在列车上相遇，仅仅结伴做了四个钟头的同路人。谁会料到，这四个钟头，却在我们生活的网络上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回到S市针织厂不久，我们楼上王师傅家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王师傅五十多岁了，在旧社会就开始抽烟。六十年代初下狠心戒了，六六年在“史无前例”动乱的开始，又抽起来。最近，他时常感觉胸部剧烈疼痛，咳嗽不已，还不思饮食。就在老伴的催促与陪同下，上医院作了X光照片检查。一位好心的大夫偷偷告诉王师母，她老头子得的是致命的肺癌，到晚期了，活不了几个月：

“医院被砸烂了，回家休养吧。他想吃啥就给他弄啥吃。”这个消息，简直是一把剜刀，把王师母的心都搅碎了。难怪呵，几十年的患难夫妻，孟然遭受这么沉重的打击，能不摧肝裂肺吗？这个消息，又象当头一闷棒，把我们车间周主任敲得呆若木鸡。这几年，厂里很乱，歪风邪气盛行，唯独我们成品车间，秩序好，生产正常。这里面，哪道关口不呕过王师傅的心

血，哪个环节不落满了王师傅弹出的烟灰？！……全车间的人都叹息悲怆，背着王师傅暗暗流泪。怎么办呀？这时候，我蓦地想起了严琦。我想如果他能助一臂之力，让王师傅能多活一年、两年、三年……哎呀，这不比送几瓶罐头、说几句安慰话更有意义些吗？于是，我打电话给严琦：

“……帮帮忙吧，看在熟人的面上。”多么好笑，我措词是如此的俗气。

“好。我晚上来。”他搁上了话筒。

晚上，他真的来了，歪叼着香烟，背着药箱，他的袖口、膝盖、衣领……凡是磨破了的地方，都用胶布贴上一条条的白杠杠，活象个“大元帅”。我先把他带到我家里，给他泡茶、递烟，还问他吃过晚饭没有。他屁股不沾凳，要我找来王师傅的病历袋和爱克斯光片，眯着眼睛，对着台灯看了好一阵，便急着要上楼。看着他，车箱里他那副漫不经心的邋遢劲，一扫而光，俨然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医生。我推开王师傅的房门，他一眼看见王师傅走过去寒暄几句，就坐下来，聊起天来。他们从北京城隍、南京土地，一直谈到“造反派”的威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一会儿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既随和体贴，又转弯抹角询问病情的办法。后来他低头看一眼手表，慢慢地站起来，认认真真地给王师傅看了“胸痛病”，动身告辞，还答应明天送药来。

夜深了。我送他一段路途。宽阔的柏油马路，街灯昏暗。我是头一次陪伴一个陌生的“熟人”走夜路，心里老是忐忑不安。快分手的时候，我好歹憋出一句话来：

“麻烦你了。……”

“没关系。反正是一个人。”他冷冷

地说。

“你爱人呢？”

“我没结婚……”

“有朋友吗？”

“原先有过。我不上心。吹了。”

“那么，现在呢？”

“现在？人老了，牌子臭了，没人要了。”……

从那天起，严琦隔上两三天就要来王师傅家里一趟。听王师母说，严琦过去曾拜老中医、老草医为师，搜集了许多民间的单方、验方，正在给老头子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看不出，这个马虎邋遢的人，还真有几手。经他的治疗，王师傅的病情有所好转，稳定了很长一个时期。王师傅也很听他的话，为了配合治疗“胸痛”，把烟戒了。王师母也搞不清我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一来，总要喊我去陪。慢慢地，我们变得十分融洽，一谈起社会上一些坏风气，他就闷头抽烟，唉声叹气，忧心忡忡。我们在一起逗兰兰玩，谈着孩子的兴趣和爱好，也谈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和经历。因为他是客人，我在家里总备有几包高级香烟专门招待他；但看到他狠命地抽烟，一种莫名的担忧就在我心头缠绕，间或也劝说他两句。是呵，人，也无时无刻不处在矛盾运动之中。奇怪的是，他和兰兰在一起，就变得欢快起来。兰兰这孩子顽皮，也不知个天高地厚。在我的怂恿操纵下，她经常爬到严琦的身上，抢他的烟，搜他的口袋，没收他的火柴。兰兰的“战利品”真不少，光火柴就有十七、八盒，把严琦弄个啼笑皆非。就这样，我们互相融化着感情。他有几天不来，我会坐卧不安；他来了，我又忙个手脚不停。同栋楼的邻居们开始说长道短了，车间里的姊妹们向我宣传“坦白从宽”的政策了。真的，我品尝不出心里有什么滋味，好象酸、甜、苦、辣……都

有。

有一次，严琦在星期天下午来给王师傅看病，我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兰兰出去玩去了。严琦坐在藤椅上抽着烟，翻来复去地摆弄着那只精装漂亮的烟盒。看着他愈来愈消瘦的面庞，我心神恍惚不安。

“把烟戒掉吧。”我忧心忡忡地说。

“你要我戒烟，”他望着我，幽默地回答，“为什么还要买烟来毒害我？”

我羞赧地避开他的目光，心里乱极了，不晓得再说什么才好。我突然站起来，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到立柜前，取出一件咖啡色的毛衣。

“这，是那次在火车上织的，”我鼻子一酸，“本来是给他织的，可他……给你吧……只要你不忌讳……”

他惶恐地站起来，捧着毛衣，茫然不知所措。

“天冷了，穿上吧。”

“嗯……”看得出，他心慌意乱了，手在颤抖。

“看你，当个什么大元师，一身的杠杠。衣服破了，换下来……我给你补。”

“嗯……”

“还有，下星期，把被子拆了，拿来……”

“嗯……”

“还有……”

啊，他似乎被一种什么力量震醒了，惊喜地说：“真的？”我感到他灼人的眸子正热喷喷地向着我，大步向我走来，我也忐忑地迎着他……

“我推开他，用双手蒙着脸。嗔怪地说：‘不好闻……’

“什么呀？”

“一口的烟味。”说完，我把头贴在他的胸脯上，喃喃地说：“莫抽烟了……抽烟，是有害的。”

“嗯……好。”

第二次爱情就这样萌芽了。我们相互尊重，慎重地培养着感情的花朵。说来也奇怪，一月、两月……整整一年，他再没有抽一支香烟。不仅如此，他还欣然接受周主任的建议，在我们厂里举办了几次关于吸烟有害的卫生知识讲座。效果呢？有三十多个男同志把烟戒掉了。有个喜欢摆阔气的年轻后生，在年底用戒烟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块上海牌女式手表。给谁的？这我可不知道。更有趣的是，有个叫菊妹的年轻女工，向她刚结婚不久的丈夫发出了最后通牒：如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把烟戒掉，则……可是，好景不常。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级台风，席卷着神州大地。不幸得很，连我们这朵纯真、朴实的爱情之花都没有放过，也被它吹上了半天云空。有段时间，他没来我这里。一个星期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又快二十天了，他始终没有来。我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我有个孩子，他开始动摇了？……我慌忙打电话找他，一共打了五次。每次回答我的都是一个凶狠狠的恶声：“你什么人？！嗯！……他不在！”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的心头。王师母也着急了，因为王师傅的病情开始恶化。她跑到肿瘤病医院去找严琦。回来的时候，王师母一脸煞白。她跟我说，医院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是对着严琦来的，说严琦是“右倾翻案的马前卒”，说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说他“向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反攻倒算”。以后，又听医院的人说，严琦编了一本册子，叫《肺癌与吸烟》，寄到了出版社。在册子里，他说文化革命中吸烟的，要比文化革命前大量增加（以我们针织厂为例，说增加了三倍）；他说文化革命以来，中学生普遍吸烟的现象值得严重注意（以S市一中为例，说男生吸烟的超过了全体男生总数的

百分之五十）；他说这几年烟不仅毒害了人们的身体，也毒害了人们的灵魂（以江南机械厂为例，说香烟赌博竟成了最流行的娱乐）；他说文化革命以来吸烟人数陡涨的原因，与家庭、个人遭遇有关，与学校教育有关，与社会风气有关。所有这些都成了他“诬蔑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抹黑”的罪证。

我哭了好几天。夜晚，我孤独地嚼着苦涩的日子；早晨，我惊慌地回味着恐怖的恶梦。我为他的处境牵肠挂肚。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来了一位陌生的男人。他不道名姓，交给我一个报纸包的纸包，转身就走。我拆开纸包，里面有一条绿色的腈纶围巾，一件红色的条绒女童衣，一张中药处方笺，还有一封信。啊，是他……是严琦的亲笔字迹。我展开信纸，泪水也跟着扑簌簌地滴落下来：

芸：

围巾，是给你的；衣，是给兰兰的；药处方，请速转王师母……我正在隔离审查。这房子里，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想抽烟。求求你、帮我买三条烟吧……

这天下午，我买了三条香烟，送到肿瘤病医院。专案组的人不让我见他，接过香烟，就把我打发走了。从这以后，我和他断绝了音讯，听别人说，他在反省期间很嚣张，案子加重了，转到了公安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天天盼呵等呵，一直没有消息。七六年五月，我接受厂部的安排，到K市协助新厂培训工人去了，直到今天上午才回来，听王师母说，严琦刚刚平反……

我仿佛象一个情思悠悠的游魂，不知不觉飘到了肿瘤医院的大门。我是多么想马上见到他啊！

“喂喂，找谁？”我被传达室的老同志拦住了。

“我找严琦。”我说。

“他不在家。上电视台去了。”老传达望着我匆忙的神色，又说：“你进来稍等一会吧，他八点钟坐车回来。快了。”

传达室款式新颖，分前后两间。里间摆着一台十四吋彩色电视机，有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收看。我牵着兰兰，在一处角落里坐下来。

“观众同志们，现在是《知识与健康》节目时间。”电视屏幕上一位烫发的女解说员甜密地笑着，把我从惆怅的思绪中拉了回来，“……先请江南机械厂青年徒工李小兵谈谈：他是怎样下决心戒烟的——”

荧光一闪，女解说员隐去，化出一个健康整洁的年轻小伙子。好面熟呵，似曾哪里相见过？是……我揉了揉眼皮，再瞪大一瞧：哎呀，这不是列车上遇到的那个不怕“和尚丁”、“尼姑丁”的调皮鬼吗？天哪，长多高了，也长健壮多了，一派英俊、潇洒男子汉气概。你是怎么戒掉的？呵……呵……好哇！

三分钟，李小兵隐去，女解说员又出来：“现在请——S市肿瘤病医院研究室主任严琦同志讲：‘吸烟，是有害的。’”看电视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天哪！我的眼睛燃烧起来，瞳孔里还炸跳出两点闪光的火星。我控制不住自己，牵着兰兰向电视机走去。一个亲切、熟悉的面庞在我眼前闪烁着，连那额上的皱纹也牵着我的心思一起跳动。他向着观众，不，向着我，微笑着，就象那天晚上一样。不，不一样，那天晚上，我分明闻到了一股烟味。今天晚上，我们又挨得这么近，怎么闻不到烟味呢？你戒了吗？……

“同志们，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

中，我们要百倍地珍惜革命的本钱——身体。吸烟，是有害的……”

他的声音低沉、浑厚，他的语气坚定、有力。

“……现在市场上有戒烟糖和戒烟茶……但是，要下决心把烟戒掉，主要靠的是意志和毅力……”

是啊，意志……毅力！我看着手中的戒烟糖，不禁纳闷起来：等一会，他回来，把这玩意儿作见面礼，适合吗？……

生死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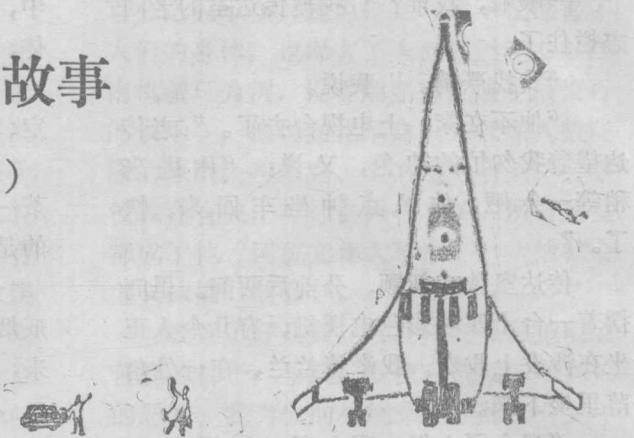
——尼古丁与王老瘾谈情

盛气凌人的烟蒂袅起青烟缕缕，缭绕的烟雾化出一个妖艳的美女。“你是谁？”王老瘾惊喜地问，多姿美女掩面一笑：“蠢人不认妻！”还记得吗？我们初次相识，你在媒婆面前还摆手挑剔。怎奈我纠缠不休，百般引诱。一次生，两次熟，我总也不离你。焦虑中我为你伴陪，失意时我给你安慰。一步步我钻进了你的心里，终于，我们心心相印结下情谊。从每天几支到嘴上叨往不离，你对我形影不离，如醉如迷。从“伸手牌”到“蛤蟆癞”，我们的“爱情”升级又升级。我大摇大摆钻进你的血管和心肺，如同悟空大闹天宫处处不由你。可笑的糊涂虫——王老瘾，至今还不完全了解我的威力。一口烟能喷出四十亿粒微尘，许多化合物都是健康的劲敌。特别是我尼古丁发起脾气，管叫你百病缠身卧床不起。如今知识已把人类的智慧启迪，科学正向全世界宣布我的死期。王老瘾哪！快快结束咱的生死恋吧！为“四化”，千万保重你的身体。

2001年采访到的故事

(科学幻想小说)

鲁 南



记者柳直最后一个跑上飞机，他刚找到座位，飞机就滑动了。他无心欣赏舷窗外的景色、而是在回顾一个人的往事。这个人就是他这次采访对象，全世界知名的脏器移植专家丁一子。

丁一子与柳直，是大学以前的老同学，小学、初中、高中他们都在一起。柳直现在想到的第一个清楚的往事，就是在高中时，有一次考数学而丁一子交了一张物理卷的笑话。丁一子是高材生，这是老师、同学公认的。他酷爱一切学科。考数学的前几天，他正在设计一个收音机的电路图，接到数学考题没算上半个题，忽然想到一个新的电路，他就在考卷上画了起来，越画越有新发现，思路为这个电路垄断，画完就交卷走出课堂。虽然发生过这种荒唐事，但老师还是真心诚意地喜欢他。

这件事还没有回顾完了，“青蛙事件”又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柳直的眼前。有一次，讲生理的老师说下次我将给你们解剖几个青蛙，来说明各种脏器的位置及功能，谁料丁一子这个粗鲁的有心人为每个同学抓一个青蛙背到课堂来，还没到生理课，在第一堂语文课上，有一只青蛙就从他本来用线缝过的书包中逃了出来，并且一个弹跳，就蹦到后面一个女同学的书桌

上，老师正讲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突然传来这个女同学的一声尖叫，脸色惨白，眼睛一直，竟晕过去了；而由于那只青蛙的带头，五十多只青蛙争相逃散。当时只顾救人，谁顾得青蛙，可是这些小家伙偏偏象是爱与女同学开玩笑，吓得一些女同学跳桌的，上凳的，尖叫四起；等老师从白居易《琵琶行》诗意中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天下大乱”了。正在这时，生理老师又提着几只青蛙走进了课堂，语文老师正在安抚那位已经苏醒的女同学，看到生理老师又提来青蛙，更是火冒三丈了。他冲着生理老师大吼道：“真真岂有此理，五十多个青蛙还不够热闹，你还提了几个，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真真岂有此理。看看，把我的高材生吓昏了”，说着，语文老师与扶着那位颇具林妹妹风韵的高材生的几个女同学走出课堂。丁一子扯起一片外衣擦了擦他复擒五十二只青蛙急出的满头大汗。勿须多说，生理老师全明白了。所以他高兴地走上讲台，环视一周，大家镇定下来。只听他说：“每人解剖一只青蛙，还可能吓昏者，可以退场”这大概是他对语文老师抗议的回答。……是服务员送茶水，才把柳直从“青蛙事件”的回顾中叫醒过来。

呷了一口茶，柳直才确切感到自己原

是在飞机上。这种回忆是别具幸福滋味的，这些还属少年的往事，使柳直增加了对丁一子的亲切感，但仿佛使采访更艰巨了。这些顽皮的往事与举世知名的专家之间是多大的距离啊；但是，也可能正是这些性格特征中的某种东西，与以后的巨大成就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

二

因为机场离丁一子的家近，所以柳直决定不到机关，先到丁一子家。他按照地址，找到了湘妃七楼。这是个新的建筑群，都是二十层以上的高楼。丁一子住在第十八层的第十五号房间。柳直乘随时开放的电梯来到第十八层，找7.18.15号房间，按了电铃。

铃声响过，室内传出少女的问话声：

“请问您是谁？”少女强调“您”字，好象提醒人们注意她的礼貌。

“我是柳直，《往事》月刊的记者……”还没等柳直说完，门开了，少女抢着说：

“知道啦，是来采访主人的事迹的，已经收到了您的电报，主人今天或者还加上明天必须亲自观察他刚刚手术成功的病人，他说他不愿意听信别人转告给他的重要数据，就是说，重要数据他都要亲自记录。他从来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请您在家等他，他给留了便条。请进屋吧。”

柳直几乎没见到这位少女喘一口气，十分流利，但过于认真地咬文嚼字地说完了这一切。他也好象听完了才喘了口气。这时他才回想刚才那些话中有些使人不自在的地方。对，想起来了，少女怎么称主人的事迹？她是谁？在柳直眼中她象谁；实在象一个人。这个人在柳直脑海里时隐时现，但记忆并没有给他确切的回答。所以柳直想干脆问个明白：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小春。我是谁呢？我不知怎样回答您更确切，主人有时叫我小春，有时叫我女儿。”

少女的答话，似乎使柳直不快，怎么“她是谁”还会回答不清？柳直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床上方的一张合照走去。少女见客人要看照片，很快地开了灯。柳直回头瞪了小春一眼，心里想，看回答问话，好象有点蠢，但这时开灯，倒是十分机灵。待柳直看了合照，才恍然大悟，原来小春象的，正是孟一春，身材修长，大方，漂亮。对，肯定是她，因为与丁一子要好，所以他们一起上了医学院。她那对似乎天生就含有一种哀伤的深情的秀眼，又浮现他的面前，他们对视了一下，那些沉睡了五十多年的记忆重新活跃起来，往事犹如现实，他迅速把眼光移开了，就象五十多年前一样迅速移开了，但是他又享受了那种激动与幸福……

“你原来是孟一春的女儿……”柳直热情地转对少女说。

“不，我，我，我只是一个机器人”。

少女的回答，使柳直惊呆了。他坐到沙发上，凝视着这位宛如活人的少女。然后他把眼光又向丁一子与孟一春的合照望去。就在这时，少女开始了她的讲述：

“听说是这样：主人同孟一春分别了。怎样分别的，主人好象从来不愿讲，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分别使主人十分痛苦，并使他没有再结婚。主人只有一个妹妹，她的爱人是一个机器人厂的总工程师。据说妹妹对哥哥的痛苦深表同情，就一再建议她的丈夫为她哥哥设计一个能够象孟一春的机器人，这就是我象孟一春和主人叫我小春和有时干脆叫我女儿的原因。除了这种视觉上的安慰，我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主人料理生活，我可以烧饭、洗衣，处理家务，上街买菜等等。设计我的